

衣冠西渡

抗战时期政府机构大迁移

唐润明 著

第一次以时间为线索，梳理大量史料，详尽阐释国民政府
迁都重庆的背景、决策经过及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的全过
程，揭示了国民政府这一迁移举措对抗日战争走向及战后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衣冠西渡

抗战时期政府机构大迁移

唐润明 著



创立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衣冠西渡:抗战时期的政府机构大迁移/唐润明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抗战大迁移丛书)

ISBN 978-7-100-11846-0

I. ①衣… II. ①唐… III. ①国家行政机关—迁移—史料—
中国—1937~1945 IV. ①D6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065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衣冠西渡

抗战时期的政府机构大迁移

唐润明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846-0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6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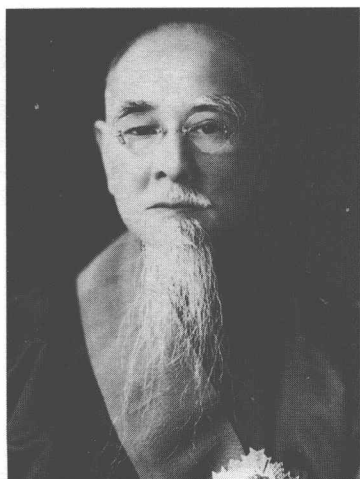
定价:52.00 元



1937 年的重庆江景



抗战全面爆发前的重庆



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
林森



蒋介石 1945 年 6 月赠送同盟国
友人戎装照



抗战时期的林森、蒋介石与孔祥熙在一起



抗战时期长期任国民政府行政院
院长的孔祥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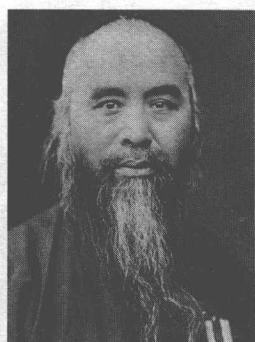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立法院
院长的孙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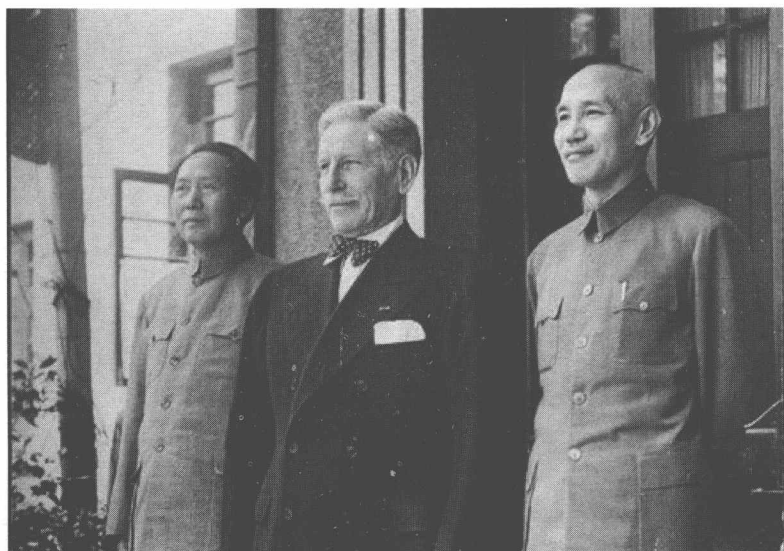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
司法院
院长的居正



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
考试院
院长的戴传贤



抗战时期任国民政府
监察院
院长的于右任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与蒋介石、赫尔利合影



1945年9月3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庆祝抗战胜利情形

总 序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前夕，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抗战大迁移”丛书，共五本：唐润明《衣冠西渡——抗战时期政府机构大迁移》，张守广《筚路蓝缕——抗战时期厂矿企业大迁移》，孟国祥《烽火薪传——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王红曼《伏线千里——抗战时期金融机构大迁移》，常云平、刘力《乱世飘蓬——抗战时期难民大迁移》。

南宋以降，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向东南转移，民国建立，孙中山、蒋介石先后定都南京，政治中心也自北京转到南方。东南一带濒海，有与海外交通、习染欧风美雨之利，繁荣富庶，人丁丛衍。然而，利弊相生，东南一带地势平坦，不是能攻易守之地。近代和古代不同，古代中国的外敌大多来自北方，而近代中国的外敌则大都来自海上。这样，东南地区地理上的优势便转化为军事上的劣势，一旦外敌入侵，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和政治中心的南京等地便立即暴露于敌人的炮口之下。南京，一向以龙盘虎踞著称，但早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就判定，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南京不是可战之地。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于次年 1 月进攻上海闸北，发生“一·二八”淞沪抗战。当时，蒋介石就曾考虑“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问题，认为“政府倘不迁移，则随时遭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两天后，国民政府暂移洛阳办

公。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西安为西京，洛阳为行都。洛阳虽处于中国中心，但属于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并不能成为理想的战时首都。12月1日，国民政府迁回南京。

迁都，只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的转移。1934年1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向会议提出《确立今后物质建设根本方针案》，其中提出：国家及私人大工业今后避免集中于海口；道路、航路之开辟，尤须首先完成西向之干线，使吾国于海口外，尚有不受海上敌国封锁之出入口；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地区，确立国防军事中心地。这一方案的提出，表明当时国民党领导人在设计经济建设计划时，已经考虑到对日作战的需要，并且考虑到向西部发展的问题。因此，蒋介石在为自己规定当年任务时，即列入“专心建设西南”一项。1935年2月，他在庐山规划国防工业方案，电令赶筑西南各省公路。同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演讲，明确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他特别致电孔祥熙，告以“我方军事与政治中心全在四川”。1936年6月，蒋介石对来华的英国经济学家李滋·罗斯表示：“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这一谈话表明，在蒋介石心中，其抗日计划已经非常明晰。同年9月，陈济棠、李宗仁等发动的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认为“集中对倭”的条件已经成熟。当时，中日之间的“调整国交”谈判陷入僵局，日本态度强硬，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蒋介石指示冯玉祥、程潜、朱培德等人拟具抗战方案，首先进攻上海日军，指示孔祥熙将上海的现银、钞票等迅速转移到南昌等地，指示在南京的中央政府各部门做迁移准

备。这就表明，差不多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一年，国民党、国民政府已经有了迁移的准备和计划。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继之以淞沪抗战。日军以28万人之众，动用军舰三十余艘，飞机五百余架，坦克三百余辆，大举进犯。中国军队以落后的武器和血肉之躯英勇抵抗，血战三个月。11月12日，上海沦陷。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迁都重庆。当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舰西上，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等五院随迁。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谴责日军“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宣言》表示：“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在此前后，各政府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文化团体响应国家号召，前所未有地紧张动员，争分夺秒，纷纷西迁，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不甘于受日寇的欺压、蹂躏，扶老挈幼，千里跋涉，倾室流亡，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未有的大迁移、大搬家。这一迁移，动员之广泛，规模之宏大，过程之艰辛，民族意志之刚毅，人民爱国热情之昂扬，都是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所少见，或仅见的。它突出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临危不惊，履险不畏，在艰难条件下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可歌可泣，可记可录，值得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作为驱动民族振兴的永恒的精神财富。

多年来，当年的参与者和有心人为保留、记录这段历史做了不少工作，留下了不少资料，但是，研究和叙述这一段历史的著作还寥若

晨星，许多通史性的著作对此或语焉不详，或草率带过。现在唐润明、孟国祥等先生的这五本书，以丰富的资料，全面、深入、翔实地叙述了抗战时期，自政府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文化教育团体以至广大民众的迁移史、流亡史，评述了这一迁移在粉碎日寇速战速决阴谋，保存和发展抗战实力，建设西南后方，夺取最后胜利等方面的重大意义，这就填补了抗日战争史的一段重要空白，是民国史、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值得庆贺。

杨天石

2015年5月写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前言

首都，即一个国家的国都，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所在地，也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首都设在什么地方，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均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所以立朝必建都，建都历来被视为“国之大事”。一般说来，一朝之内，国都一旦建立，除非政权更迭，轻易是不会变动的。但古今中外，因种种原因而迁都的，则屡见不鲜。总结其迁都的规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即积极主动的迁都和消极被动的迁都，两种不同环境、条件与背景下的迁都，其结果也不尽相同。而伴随着迁都的，则是“陪都”“行都”的设立。

一个朝代、政权的稳定基本上是与其国都的稳定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首都”被誉为一个国家的精华与缩影，那么“迁都”就是历史的一道“风景线”。中国历史上的迁都，则可谓“是中国历史剧烈震荡的政治波谱图，是中国政治变迁的晴雨表”。^①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急剧动荡，反映在国都上，就是首都众多，迁都频繁。在民国存在的38年（1912—1949年）里，不仅有“首都”南京和北京，而且有“行都”洛阳，还有“陪都”西安、重庆和北平；有作为中华民国

① 辛向阳、倪健中主编：《首都中国——迁都与中国历史大动脉的流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第4页。

国民政府“准首都”的广州、武汉，也有做过国民政府败退大陆前临时“首都”的广州、重庆和武汉。就城市来说，有南京、北京（北平）、广州、武汉、洛阳、西安、重庆、成都等8个城市，平均4年一轮换，且有的城市是先后多次充当“首都”的角色，故实际上一个城市做“首都”的时间还不到4年。在这8个城市中，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有16年（1912—1928年），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有13年（1927—1937年、1946—1949年），重庆作为首都的历史有9年（1937—1946年）。这3个城市作为首都的时间总和刚好是38年，故其他城市作为“首都”的时间，只能用“昙花一现”“过眼烟云”来形容。就国都的名称来说，则先后有首都、准首都、行都、陪都和临时首都的称谓或事实；就国都存在的形式来讲，有统一时的一国之都，也有对立时的一国两都或三都，还有首都沦陷、陪都成立以及首都与陪都同时存在的情形，其设立之复杂，变迁之频繁，不仅为中国历史上仅有，也为世界历史上罕见。

“首都”频繁变迁，迁都的过程也是纷纷扰扰。民国时期的迁都，既有主动，也有被动的迁都；既有因国内战争、斗争，也有在外来侵略势力压迫下的迁都。就迁都的结果而言，则以1937年全面对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最具价值和意义，且存在的时间也最长。但长时期来，人们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一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的事件，鲜有专门研究，也未给其正确的地位与评价。即使个别专著有所涉及，也是要么泛泛而谈，轻描淡写；要么避重就轻，一笔带过；要么演义重于史实，错漏颇多。笔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关注这一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并广泛收集相关资料，相继完成了与此课题相关的一系列成果。在2015年中国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到来之前，商务印书馆组织编辑出版“抗战大迁移丛书”，笔者有幸忝列其中，在认真梳理、总结先前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资料收集的广度和深度，深入探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原因、经过、影响及其对重庆、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作用，力争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及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的全过程。既企望能填补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也希望引起学界对这一重大事件的重视。书中的不妥、不当、不是之处，敬请专家学者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	1
一、首都的定义及其重要地位	2
二、“虎踞龙盘”之南京	5
三、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	9
第二章 中日局部战争态势下的对日方略	17
一、一·二八事变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	18
二、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中国对日的总体方略	26
三、国民党中央势力入川与四川抗日根据地的确定	37
第三章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57
一、国民党中央对四川的经营与建设	58
二、全面抗战爆发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84
三、重庆、四川各界欢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	126
四、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原因与作用	136

第四章 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	169
一、重庆成为中国战时的政治中心	170
二、重庆成为中国战时的军事中心	206
三、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经济中心	257
四、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教育文化中心	298
第五章 日机轰炸重庆及国民政府对重庆的防卫	327
一、抗战时期重庆政治地位的提高与市区范围的拓展	328
二、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及重庆防空司令部的应对	352
三、国民政府对重庆的全面防卫	399
第六章 抗战胜利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431
一、重庆人民欢庆抗战胜利	432
二、国民政府对还都南京的筹划与实施	447
三、还都后的重庆	485

第一章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

- 一、首都的定义及其重要地位
- 二、『虎踞龙盘』之南京
- 三、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